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本文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二元结构 区域经济增长

一、对现有研究的简要回顾

最近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Firebaugh(1992)比较了国内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他发现,尽管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外国资本,但二者都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Borenztein、Gregorio和Lee(1998)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国内投资。Amirahmadi和Wu(1994)甚至将经济衰退部分归因于外国投资的缺乏。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因此,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短缺。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和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Chenery and Strout, 1966)。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人文资本集聚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在发展中国家,一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员工素质较差,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和营销技能。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将可以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转移到东道国,从而改善东道国的生产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增强东道国国内部门技术效能的这种作用可能是巨大的,虽然这种作用有时难以衡量(Helleiner, 1989)。

此外,通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也能够刺激国内部门的增长。这种产业联系,既包括前向联系,如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也包括后向联系,如从当地购买投入品。很明显,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这种诱导性要素需求,将对国内部门产生多方面的需求,由此对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增长产生乘数和加速作用(Jansen, 1995; Sun, 1996)。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越过边界的跨国投资和跨国并购迅猛增长,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产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加。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还将有利于东道国接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之专题研究报告,该项目批准号为79770097。

近国际市场,增加东道国的出口,而这种出口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中,出口的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这种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商投资(三资企业)来推动的。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 Lee、Rana 和 Iwasaki (1986)研究了9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外国私人投资和外国援助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外国私人投资对GDP增长具有重要的有利影响,但对国内储蓄有着不太显著的正的影响;而外国援助对GDP增长具有一个不显著的正的影响,对国内储蓄则有着负的影响。Tu (1990)和 Schive (1990)以中国台湾为例,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私人消费以及进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但对私人消费和进口没有显著的影响。

Jansen (1995)在对泰国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有着直接而强烈的正的影响,并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Athukorala 和 Menon (1995)发现,在过去20年中,外商直接投资在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De Mello (1997)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产出增长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其对国内公司所产生的效率溢出的大小,而这种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产生国内生产报酬递增以及外商投资相关生产附加值的增加来实现的。

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 Kueh (1992)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商和出口商。Sun (1998)则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国内,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地区收入和增长率差距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地区差距的衡量及其变动趋势方面,而很少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二元结构特征

自1979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以至于一些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事实上,光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之为“中国的奇迹”并不过分。1979—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6%,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8.2%。在20年来的时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高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9)发表的《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1980—199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10.2%,1990—1998年为11.1%。而在这两个时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3.2%和2.4%,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只有3.5%和3.3%,高收入国家分别只有3.1%和2.1%。可见,在80年代,中国GDP平均增长速度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90年代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6倍。

当然,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是通过不平衡的增长途径来实现的。虽然从省级地域单元来看,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一定程度上在趋于收敛(魏后凯,1997;宋学明,1996),但从大的地带范围来看,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和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在70年代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种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而改革开放以来则逐步转变为东西差异(陆大道、薛凤旋等,1997)。

为便于分析这种二元结构特征,我们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即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前者的典型代表有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含海南),而后的典型代表有广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所以把广西和内蒙古列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典型,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省区同属少数民族自治区,且在地理上临近西南和西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优惠。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类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一直在趋于扩大。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东西二元结构的形成是历史和自然因素、地理区位、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但毫无疑问,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外商和港澳台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对于东西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及东西差距的扩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很明显,由于东部地区拥有或者临近主要海港,比邻港澳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外交通条件方便,加上国家实行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外商投资最先流入东部地区。而这种早期的外商投资的进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产生一种累积因果效应,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进入和集聚。据外经贸部提供的数据,截止1999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75%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其中广东为28.25%,江苏为12.13%,福建为9.78%,上海为8.19%;而西部落后地区仅占5.48%,如果不包括广西则只有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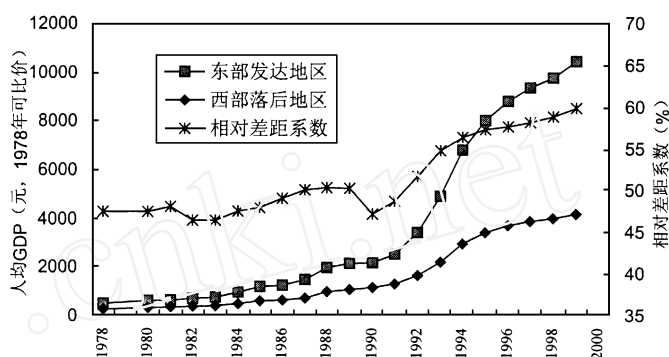


图1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人均GDP及相对差距

外商投资地区分布的这种高度不平衡性,给各地区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资本形成来看,在1983—1991年间,东部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为4.04%,而西部落后地区平均只有0.78%。1992年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其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日显重要。在1992—1999年间,东部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已达到19.68%,而西部落后地区仍然停留在东部发达地区80年代的水平,该比重平均只有4.35%。很明显,外商投资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这种巨大差异,对东西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外商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有着很大的差异。

上述这种方法对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有些高估,因为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并没有完全形成固定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流动资产使用的。事实上,在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东部发达地区利用外资只占10.1%,西部落后地区由于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高,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为3.6%。除了资本形成之外,外商投资对各地区就业、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从工业产出来看,1999年“三资”工业产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东部发达地区为34.1%,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7.4%;“三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东部发达地区为31.4%,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6.3%。再从商品出口来看,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东部发达地区为48.9%,而西部落后地区只有10.7%。

表 1 1983—1999 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的重要性

年份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亿美元)		外商投资相当于 GDP 的比重(%)		外商投资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1983	5.30	0.44	0.36	0.07	1.57	0.35
1984	8.34	0.41	0.55	0.07	2.16	0.28
1985	11.53	1.01	0.79	0.18	2.75	0.60
1986	14.59	1.57	1.05	0.29	3.34	1.01
1987	15.34	1.72	1.00	0.29	3.03	1.02
1988	27.20	2.08	1.39	0.28	4.29	1.03
1989	30.54	1.90	1.41	0.23	5.36	0.99
1990	31.66	1.43	1.71	0.19	6.47	0.86
1991	40.60	1.69	2.09	0.22	7.42	0.89
1992	98.64	3.95	3.90	0.43	12.24	1.56
1993	230.03	19.96	7.01	1.76	17.82	5.28
1994	283.84	23.11	9.68	2.36	24.42	7.31
1995	319.69	18.75	8.34	1.50	21.84	4.88
1996	358.82	17.36	7.89	1.17	21.59	3.99
1997	390.51	25.44	7.61	1.54	21.96	5.13
1998	404.48	23.51	7.25	1.33	20.46	3.86
1999	358.56	18.40	5.98	0.99	17.13	2.81

注:本表中的比重按当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价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79—1991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计算。

显然,采用三资企业数据来衡量外商投资的作用,同样会出现一定的高估现象。因为在目前我国三资企业的注册资本构成中,外方只占 68%左右,其余部分均为国内资本。即使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和出口扩张,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相反,在西部落后地区,外商投资的这种影响则较为微弱。

三、研究方法、模型设计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假定,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差异直接诱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换句话说,外商在华投资分布的不平衡性是导致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着重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 GDP 增长率差异的影响。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成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而国内投资又可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其中,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看成是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将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如果以 GDP 代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DK 代表国内投资(亿元), DFK 代表国内政府投资(亿元), DPK 代表国内民间投资(亿元), FDI 代表外商投资(万美元), L 代表劳动力就业人数(万人), 那么, 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GDP = f(DK, FDI, L) \quad (1)$$

上式也可以表达为:

$$GDP = A DK FDI L \quad (2)$$

由于 $DK = DFK + DPK$, 因此, 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GDP = A DFK^1 DPK^2 FDI L \quad (3)$$

两边取对数, 模型(2)和(3)可以写成为:

$$\ln GDP = c + \ln DK + \ln FDI + \ln L + ui \quad (4)$$

$$\ln GDP = c + \beta_1 \ln DFK + \beta_2 \ln DPK + \ln FDI + \ln L + ui \quad (5)$$

式中: c 为方程估计的截距, ui 为统计误差, 系数 β_1 、 β_2 、 β_3 、 β_4 分别是 DK 、 FDI 、 L 、 DFK 、 DPK 增长对 GDP 增长的估计弹性。

该模型是在 Kmenta (1996) 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它是一个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模型, 比较适合于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 因为它考虑到了横断面的余值异方差性和时间序列的自相关。

根据前面的分析, 国内投资、外商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 GDP 增长有着正的影响, 因此, 可以期望各种投入对 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值为正。然而, 可以设想, 外商直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在三大地带将具有较大的差异, 而且东部发达地区要比西部落后地区强得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外资在东部发达地区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中的作用较大。

直到 1991 年, 中国才开始公布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因此,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我们统一采用全国 GDP 缩减指数作为价格指数, 以消除物价因素对 GDP 和国内投资增长的影响。各地区劳动力就业系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数, 外商投资则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数据, 并采用美国的 GDP 缩减指数作为价格指数。 GDP 缩减指数的计算, 系采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 增长指数除以按可比价格或者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指数。其中, 中国采用 1985 年可比价格计算, 美国则采用 1996 年不变价格计算。

国内投资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则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国内政府投资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有单位银行贷款之和来表示, 而国内民间投资则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外商投资和国内政府投资来表示。所以将国有单位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投资,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银行绝大部分为国有银行, 各级政府对银行资金的投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种经济甚至行政手段等措施, 调节和引导银行贷款的投资方向。

除特别说明外, 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1979—1991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虽然在 1997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了各地区对外借款的数据, 但 1998—1999 年只有全国的总体数据, 而缺乏各地区的数据。

四、对 1985—1999 年的实证分析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这里我们将选择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采用 1985—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分别研究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其次,采用 1996—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并将国内资本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个部分,对区域增长模型重新进行估算。

考虑到海南省和重庆市设立时间较短,在进行时间序列和横断面分析时,仍将海南包括在广东省,将重庆包括在四川省之内,以保持各年度统计数据的一致性。西藏自治区几乎没有吸收到外商直接投资,因而不在于模型分析之列。这样,在 1985—1999 年间,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各有 10 个省市,15 年合计共有 150 个分析样本。由于甘肃在 1987 年和 1989 年、青海在 1986 年、1989—1991 年和 1998 年、新疆在 1987 年和 1992 年没有吸收到外商投资或者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所以这期间西部落后地区实际有效分析样本只有 141 个。在 1993—1999 年间,东部发达地区有 40 个分析样本,西部落后地区有 39 个分析样本。表 2 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2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 $\ln GDP$ 的回归结果

	1985—1999 年		1996—1999 年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落后地区
常数	0.367 ^{***} (2.911)	-0.181 ^{**} (-2.129)	-0.495 (-1.410)	0.465 ^{**} (2.677)
$\ln L$	0.361 ^{***} [0.391] (20.72)	0.365 ^{***} [0.383] (20.07)	0.415 ^{***} [0.594] (12.924)	0.292 ^{***} [0.313] (5.39)
$\ln DK/\ln DFK$	0.481 ^{***} [0.609] (21.81)	0.703 ^{***} [0.655] (28.30)	0.253 ^{***} [0.200] (3.60)	0.353 ^{***} [0.253] (5.097)
$\ln FDI$	0.0775 ^{***} [0.187] (7.454)	0.00493 [0.012] (0.577)	0.159 ^{***} [0.205] (5.95)	0.0385 [0.074] (1.28)
$\ln DPK$	- - -	- - -	0.252 ^{***} [0.249] (3.721)	0.403 ^{***} [0.417] (6.153)
样本数	150	141	40	39
调整后的 R^2	0.963	0.980	0.958	0.978
误差	0.1354	0.1297	0.1169	0.1310
F 值	1297.6	2285.5	222.99	431.3
F 的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为 T 检验,方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

分析结果表明,在 1985—1999 年间,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落后地区,模型调整后的 R^2

均在 0.96 以上, F 值均在 0.00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说明, 两个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 大体可以解释 GDP 变化的 96% 以上。在这期间, 东部发达地区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的影响, 其弹性系数为 0.078。进行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ln FDI$ 在 0.00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西部落后地区, 尽管 $\ln FDI$ 的系数值为正, 但即使是在 0.10 的水平也缺乏显著性。这说明, 外商投资对西部落后地区 GDP 增长具有不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各要素投入的标准回归系数来看, 对 GDP 增长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内资本, 其次是劳动力投入, 而外商投资的影响则比较小, 即使在东部发达地区也是如此。然而, 如果对两个地区进行比较, 则可以发现二者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在东部发达地区, $\ln FDI$ 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187, 而西部落后地区则只有 0.012。这一点恰好证明了前面我们提出的假设。事实上, 如果采用上述模型中 GDP 对 L、DK 和 FDI 的估计弹性系数, 则可以推算出两个地区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 (Sun, 1998)。

在 1986—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 GDP 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11.34%, L、DK 和 FDI 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40%、16.14% 和 24.64%。同期, 西部落后地区 GDP 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9.40%, L、DK 和 FDI 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72%、11.37% 和 19.96%。根据前面估计的 GDP 增长方程, 东部发达地区 GDP 估计增长率为 10.54%, 西部落后地区为 8.538%。其中, 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东部发达地区为 18.11%, 西部落后地区为 1.15%。据此推算,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 GDP 估计增长率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引起的。这一点与 Sun (1998) 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差异。按照 Sun (1998) 的分析, 在 1985—1995 年间, 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8.5%, 而西部地区为 12.5%。

如果将国内投资分解为国内政府投资和国内民间投资, 并采用 1996—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进行分析, 则同样可以发现两地区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在东部发达地区, $\ln GDP$ 对外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 0.159, 显著性水平为 0.000; 而西部落后地区该系数只有 0.0385, 且在 0.10 的水平缺乏显著性。这两个模型均具有统计意义, 调整后的 R^2 均在 0.95 以上, 说明模型可以解释 GDP 变化的 95% 以上。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 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和经济技术基础较好, 已经吸引了进入中国的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 将通过增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又将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的容量,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条件, 产生集聚经济效益, 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这样, 就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这种由出口和外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单纯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 外商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 GDP 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影响缺乏显著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 1985—1999 年间,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这说明, 在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 可以预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投资软硬环境较好, 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因此, 要促使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 将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西进, 今后除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外, 更重要的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和

产业配套条件。

参考文献

- 陆大道、薛凤旋等,1997:《1997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
- 林毅夫等,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 宋学明,199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收敛性》,《经济研究》第9期。
- 魏后凯,1997:《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Amirahmadi, Hooshang and Weiping Wu, 199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8: 167—190.
- Athukorala, P. and J. Menon, 1995, "Developing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Malaysia",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1st Quarter, 9—22.
- Borenstein, E., J. De Gregorio, and J. W. Lee, 1998,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115—135.
- Chenery, H. B. and A. M. Strout, 1966,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4), Part1, 679—733.
- De Mello, Luiz R.,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 and Growth: a Selective Surve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4(1): 1—34.
- Firebaugh, Gen, 1992, "Growth Effec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05—130.
- Helleiner, G. K., 198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H.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II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441—80.
- Jansen, K., 1995,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ase of Thailand", *World Development*, 23 (2): 193—210.
- Kmenta, J., 1986, *Elements of Econometrics*, New York: Macmillan.
- Kueh, Y. Y., 1992,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637—90.
- Lee, J., P. B. Rana and Y. Iwasaki, 1986, "Effects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Staff Paper*, No. 30.
- Schive, C., 1990, *The Foreign Facto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over Institute Press.
- Sun, H., 1996,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inkage Effects: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Asian Economics*, 25(1): 5—28.
- Sun, H., 1998,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79—1996*,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Tu, J. H., 1990,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 World Bank, 1999,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子璇)

征 订 启 事

《经济研究》2002年每期定价为7.50元,全年9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51。凡在当地邮局订阅不到者,可直接向经济研究编辑部订阅。邮局汇款:100836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经济研究》杂志社傅维平收。联系电话:(010)68034153。传真:(010)68032260。本刊还有少量剩余1999年、2000年、2001年《经济研究》合订本,每年一本,每本订价100元(含邮费),订阅办法同上。

《经济研究》编辑部

Abstracts of Papers in English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from 1998 to 2002

—on study on promoting employment at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with housing finance innovation as a breach

Liu Shucheng Wang lina and Chang Xi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ASS)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a unique high growth rate" in 2001, despite slowdown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some underlying problems should not pass unnoticed. With analysis on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high priority of employment for China's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which includes the high employment in urban areas and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from rural area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olution relies upon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s of urban households. As housing a key part of urban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finance innov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households. As a result of stimulating the housing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through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will pull the rural economy, which in turn push forward urban economy. Thus, the joint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next 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y; employment; housing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P250, L850, J630

The Fluctuation of Asset price and Stability of Macroeconomy

Liu Xia hu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of price fluctuation of asset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y in this paper, it includes: the theory of price fluctuation of asset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y; the form of bubble in Japan, Chinese economy and how to avoid the bubble.

Key Words: Price of Assets; Capital Market; Stable of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E220, G120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ei Houka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There exists a typical spatial dualism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78. It has been considered that spatial dualism is closely linked with an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a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examined effects of FDI on region-

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mploying time-pooling and cross-section data between 1985 and 1999. It found that FDI 's inflows lead approximately to ninety percent of the gap in GDP growth rate between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and western un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Key Word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Regional Dualism ; Spatial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 F210 ,H770 ,O180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FDI in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u Jian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On the background of 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 group of multi-variance models are put into study in this article. The key drivers such as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per capita GDP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domestic investment quantity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domestic investment efficiency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FDI quantity and regional discrepancy of FDI efficiency ,have been analyzed here to work out a clear conclusion. Instead of FDI regional disparity ,the discrepancy of domestic investment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has been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provinc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strategy of narrowing regional difference in investment quality has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 Gni coefficient ; Investment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 F210 ,O180 ,D330 ,D610

An Exploration On China Private Investors ' Information Demand And Decision-variable Choice

Lu Zhengfei &Liu Guij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Tianxiang investment consult ,co)

Private investor is usually a weakling in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exploration , by questionnaire , of China private investors ' characters of information demand , attitude to existing information supply and the probable differences on private investors ' information demand and decision-variable choi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 found , reality , timely and full disclosur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ivate investors in China. So that ,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enhance supervision , control and punishment , to promote the listed companies and intermediaries such as accounting firms to make reliable and timely disclosure , and to encourage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make much more future-orient voluntary disclosure such as the estimation about a company 's future profitability.

Key Words : Private investor ; Information demand Decision-variable ;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gu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820 ,D810 ,G280